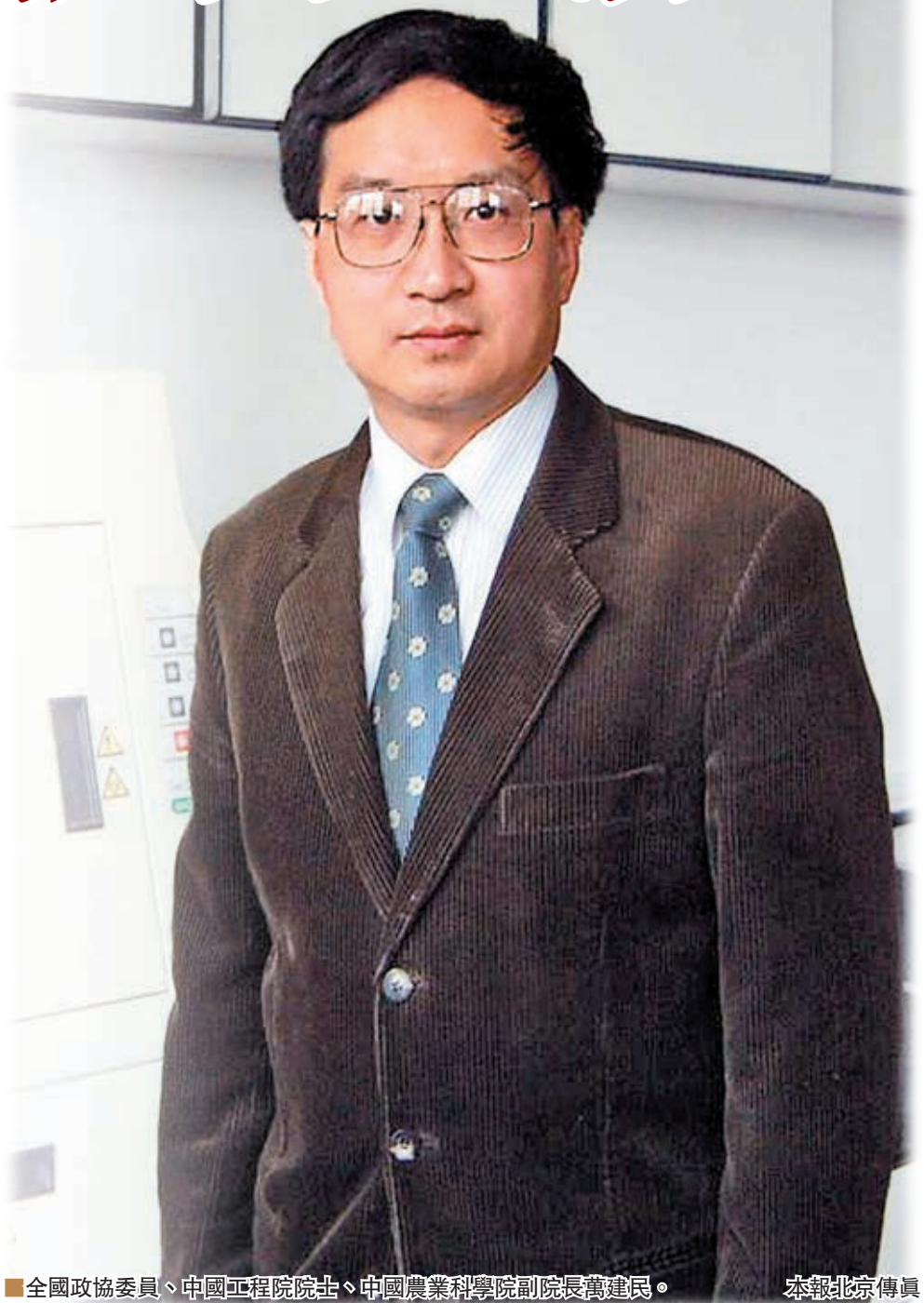


萬建民

願農民過上體面生活

「我是一個農民的孩子，祖宗三代都是農民；我出生於1960年代，那時，我切身感受到挨餓的滋味，中國農民非常辛苦卻又吃不飽飯。所以，怎樣提高農作物的單位產量和品質，是我畢生追求的工作。」作為內地水稻分子遺傳與育種領域的領軍人物，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萬建民遊歷水稻分子世界已逾三十載，碩果累累。採訪中這位典型理工男，低調少語，唯有在談及土地與農民時，他才流露出赤子之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曉雪、聶晨靜 北京報道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萬建民。 本報北京傳真

1960年，萬建民出生於江蘇泰州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農村的貧困，農業的落後和農民的艱辛，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記憶。18歲那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南京農業大學農學系，後又攻讀作物遺傳育種碩士，從此便再也沒有離開過稻田。

1992年，萬建民赴日本京都大學攻讀農學博士、博士後，1996年起任職於日本農林水產省農業研究中心。1999年4月，當被教育部聘為首批「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後，萬建民毅然放棄了日本優厚的工作條件，帶着一批寶貴的水稻遺傳研究資料，回到了祖國。

協同攻關 抗擊水稻條紋葉枯病

回母校任教不久，萬建民在學校的試驗田裡發現了發病的水稻。他敏銳判斷為水稻條紋葉枯病，而隨後，他與同事在蘇北大範圍調研的結果讓他們倍感問題嚴峻。

當時，由於大面積應用的品種均不具抗性，加之冬季氣溫持續偏高，病毒傳播介體灰飛虱發生量大以及耕作制度多樣化

等原因，該病成為南方粳稻區史上罕見的重大爆發性病害，廣大稻農損失慘重。

在此背景下，萬建民帶領協作小組，迅速展開聯合攻關，通過種質、基因、技術和信息共享，構建了南方粳稻品種選育與應用的綜合平台。短短幾年內，就選育出10個適應不同生態區的早中晚熟系列抗條紋葉枯病高產優質新品種，並得到大面積推廣。

該成果有效解決了南方粳稻區受條紋葉枯病流行危害的難題，極大促進了水稻生產發展，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農民增收和農業可持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身為項目第一完成人，萬建民也因此摘得2010年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榮譽加身 繼續做應該做的工作

去年，「兩院」公佈新增院士名單，萬建民榜上有名。中國工程院院士，是國家設立的工程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為終身榮譽。

但榮譽，對於萬建民而言，並沒有過多的誘惑。他說，當選院士對於他接下來的科研計劃，沒有任何影響，他會「繼續

做我應該做的工作」。

在他看來，院士更應嚴格律己，聚力科研，為國家的科研發展作出更大貢獻。「把過多精力放在社會活動上，放到自己不專業的領域去，那樣是一種很大的浪費。」

努力工作 為農民帶來更多好處

萬建民表示，農業、農村、農民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犧牲，而當前農民種糧規模太小，「普通農民有一、二公頃地就算多的了，但從這些土地上獲得的收益，並不能讓農民體面地生活。」他認為，要擴大種糧的規模效益，讓農民能夠從種糧當中維持體面生活，在這過程中，科技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從業以來，萬建民發現並精細定位水稻重要新基因25個，克隆基因12個；創製優異種質16份，培育寧粳1號等新品種8個；獲新品種權15項；發明專利17項。

而他努力工作的意願就是：「我希望能給農民提供不用打農藥、產量比較高、品質比較好的作物品種，為農民帶來更多好處。」



萬建民(右)在試驗田工作。 本報北京傳真

生物技術是未來農業發展方向

作為一名農業科技工作者，萬建民指出：「必須依靠科技來提高作物產量，改善品質。」而生物技術，包括分子育種和轉基因技術，非常高效，將是今後農作物改良的一個發展方向。

2013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後，萬建民呼籲，國家和社會給予生物產業更多的重視和投入。在他看來，生物技術和傳統農業技術的結合，是今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戰略選擇。「國家應堅定不移地發展生物技術產業，搶灘制高點，迎接全球新一輪新興產業競爭。」

而身為政協委員，萬建民也充分利用這一平台為農業可持續發展建言獻策，他曾在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同前正聲主席討論加強黑土地保護。對此，萬建民說，當前我國的農業生產方式基本上是牛犢式的經營。「比如，通過打地下水來種水稻，這破壞生態環境，是非可持續發展。」出於長遠的憂慮，

萬建民提出要進行適度休耕，保護黑土地。「我們不能把我們子孫的糧食都吃光了。」

保持糧食產能穩定

在內地糧食產量實現歷史性「十二連增」之際，農業部表示，「十三五」期間不追求糧食連續增產。萬建民則對本報記者說，要鞏固提高糧食產能，千萬不要挫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否則，「『十三五』規劃綱要中的『藏糧於地』很有可能成為一句空話」。

他指出，中國的糧食生產能力非常脆弱。他舉例說，1998年糧食產量達至高峰，甚至出現了「賣糧難」，但當年調整糧食產量政策之後，逐漸下降，到2003年降至最低，2004年出現糧荒。「我們花了很大努力，把糧食生產能力提高到現在這個水平。所以，我不希望調整政策又將糧食生產能力削弱，相對穩定非常重要。」



萬建民等在河北石家莊市農科院考察轉基因抗旱小麥試驗情況。 本報北京傳真



作者 褚正伯

人民政協的「前世今生」

救國會的解散

在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之時，共有14個黨派參加單位，包括：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無黨派民主人士、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其中，無黨派民主人士是沒有黨派組織但卻具有黨派性質的特殊參加單位。

但是，就在1949年12月18日，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國人民救國會即宣告解散。

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澤東主席訪問蘇聯。期間，中國人民救國會於12月18日在北京飯店舉行各界茶話會，李濟深、張瀾、林伯渠、何香凝、章伯鈞、馬敘倫、蔡廷鍇、羅隆基、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等108人出席。沈鈞儒首先致詞，並宣佈中國人民救國會解散。他說，我們救國會同仁相信一切是由時代決定的，我們首先要認識時代。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了。這使我們認識到：有了人民政協所通過的共同綱領作為施政方針，有着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中國的這一條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路，是可以坦步無憂的。我們救國會同仁徹底認清了這一點，相信了這一點。所以我們今天在大家面前，堅決地、愉快地來宣佈我們的歷史任務的終結。今後，救國會是不存在了，我們救國會同仁願意緊緊跟在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之後，為人民服務，為建設新中國而積極努力。胡愈之在茶話會上宣讀了中國人民救國會同仁給毛主席的致敬函。張瀾、李濟深、何香凝、馬敘倫、章伯鈞、章乃器先後致詞，一致對救國會為中國革命事業的艱苦奮鬥和光輝成就，以及救國會同仁今後為建設新中國而積極努力的決心表示讚揚。會後，正式發表了《中國人民救國會結束宣言》。

據有關史料記載，周恩來在茶話會開始約兩個小時後來到會場，發表即席演講，對中國人民救國會的解散表示惋惜，指出：「救國會過去做了很多事，是共產黨的好朋友。我們同甘共苦地合作過，今後還有許多工作需要你們做，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嘛！為什麼要解散？也沒有和我商量一下。現在你們已經宣佈了，我來晚了。」毛澤東從蘇聯回國後，知道救國會解散，也深表惋惜，說：「救國會是進步團體，不應當解散。」

對於救國會解散的原因，歷來有多種研究。長期以來較為普遍的一種說法是救國會自行解散，認為自身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後來隨着歷史資料的不斷公開以及諸多當事人撰寫回憶錄，很多學者認識到，救國會的解散應當與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前後關於民主黨派的整合與去留方針有緊密聯繫。在革命戰爭年代，各民主黨派的組織體系較為複雜，不僅黨派內部魚龍混雜，不同黨派相



1949年12月19日，《光明日報》頭版刊登出中國人民救國會宣告結束的消息。 資料圖片



中國人民救國會代表沙千里在新政協會上發言。 資料圖片

互之間成員交叉也較普遍，許多成員既是這個黨派的，又是那個黨派的，甚至既是這個黨派的領袖，也是那個黨派的領袖，更重要的是，一些黨派在宗旨和理念上也較為接近乃至雷同，因此在新政協的籌備和成立階段，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就曾與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商量過民主黨派的整合與去留問題。大家的意見是，建國之後除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之外，其他黨派都可適時解散。民革、民盟、民建這三個黨派分別代表了國民黨革命派、知識分子和工商業人士，在歷史上相對獨立，組織機構健全，成員也比較明確。其他黨派成員可視情併入這三個黨派。但是，隨着新中國成立之後各項建設事業的需要，特別是政治建設的需要，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對民主黨派的去留有了新的認識，認為各民主黨派都應當繼續保留並長期存在。救國會的解散是在新中國成立不足三個月之內，之間可能存在溝通上的「時差」。